政治科學論叢／第 90 期／民國 110 年 12 月／頁 1-34

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
現代日本政治思想中的多元論*

安井伸介**

摘　要

1990 年代是日本政治思想潮流的轉捩點，過度強調日本國粹意識的保守主義興起，日本的自由民主思想因而開始面臨重建自身價值的必要。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是在此脈絡下流行的思想潮流，他們共享多元理念，共同抵抗右傾化現象，可視爲當今日本政治思想中具有重要性的思想。鑒於此，本文以多元論爲主軸，從政治思想的角度探析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特徵。本文指出，國族國家、帝國主義等現代性的負面現象是日本多元論極力抵抗的對象，他們亦批判辯證法中可見的排除原理。但是，他們對於實現多元理念的方法並沒有深入的討論，其論述相當薄弱。透過本文的研究，期望能呈現當今日本自由民主思想的特徵。

關鍵詞：自由民主、多元主義、公共性、日本左派

---

* DOI:10.6166/TJPS.202112_(90).0001
本文之研究與寫作，獲得科技部研究經費之補助（MOST 106-2410-H-263-001），作者謹致謝忱。作者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以及編委會提供的寶貴意見。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E-mail: anjing@ntu.edu.tw。
收稿日期：110 年 8 月 31 日；通過日期：110 年 12 月 28 日

臺灣大學機構典藏資料庫

壹、導論

在冷戰結束、共產主義陣營瓦解之後，日本的政治生態發生巨大變化，其特徵往往被形容爲「右傾化」現象。此時期也是政治思想潮流的轉捩點，如「新歷史教科書創作會」（新しい教科書をつくる会）的運動的運動，過度強調日本國粹意識的保守主義興起。作爲此現象的描述，米原謙在概述近現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的《日本政治思想》中，以「漂流的自由民主主義」爲結尾，警惕日本政治思想界（2017：310-312）。在國粹保守與自由民主的對立架構之下，[1] 90 年代以後在日本思想界廣爲流行的思想潮流即是本文討論的「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

「公共」概念在日本的流行始於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尤其於 90 年代後期開始成爲批判性社會思想的關鍵術語，這就表示有關公共性的討論具有代替社會主義烏托邦理念的一面（稻葉振一郎，2008：9）。公共哲學在日本流行的指標是，公共哲學共同研究會從 2001 年起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的「公共哲學」系列二十本套書，此思想運動重視哲學與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跨領域交流，主要成員有韓國學者金泰昌、山脇直司、小林正彌等。他們強調公共哲學是實踐對話的運動，故積極將對話的場所推展到國外，例如，在首爾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劍橋大學、哈佛大學、歐盟本部等地舉辦過研討會，也於 2004 年 12 月與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共同舉辦過研討會，[2] 可見他們的活動相當活躍。

「共生」概念的流行也同樣始於大約 1980 年代中期。法哲學家井上達夫於 1986 年出版《共生的禮儀：作爲會話的正義》（共生の作法：会話としての正義），建築師黑川紀章於 1987 年出版《共生的思想》（共生の思想）之後，共生概念廣爲流行，例如，書名含有共生一詞的著作於 2015 年出版 308 本，從 2006 年到 2015 年間將共生當作關鍵字的論文高達 1 萬 4,015 篇

1　本文所說的「自由民主」包括維護自由民主價值的左右立場，如自由民主左派（自由主義等）以及自由民主右派（自由保守主義等）。

2　其研討會的成果後來出版爲《公私領域新探：東亞與西方觀點之比較》（黃俊傑、江宜樺，20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武谷嘉之，2017：18、35）。另一方面，學術機構也積極採納共生概念：2001 年東洋大學設立「國際共生社會研究中心」（国際共生社会研究センター）；2006 年「共生社會體系學會」（共生社会システム学会）成立；東京大學於 2007 年設立「共生國際哲學研究中心」（共生のための国際哲学研究センター）。[3] 其中，東大研究中心於 2009 年 3 月與臺灣大學哲學系共同舉辦「東西方哲學傳統中的『共生哲學』建構之嘗試」國際學術研討會，[4] 也試著與臺灣學術界接軌。可見，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在日本學術界相當流行。

在日本學術界可見如此豐富的應用公共與共生概念的研究，但是，相形之下，針對日本公共哲學或共生思想本身進行學術性研究的著作並不多見。其中，在共生思想方面，尾關周二對共生思想進行的分類，有助於了解日本共生思想的整體面貌。尾關將共生思想分類爲：具有「前近代」[5] 性質的「聖域共生論」（以黑川紀章爲代表）、具有「近代」性質的「競爭共生論」（以井上達夫爲代表）、以及具有「脫近代」（後現代）性質的「共同共生論」（以花崎皋平等人爲代表），而自身站在共同共生論的立場對其他共生論展開批判（尾關周二，2002：14-20）。尾關的研究是少數具有宏觀視角的研究，然而，由於尾關自己是共生思想的提倡者，故其論述難免附帶主觀判斷，導致其分類有些偏頗（後文詳述）。除此之外，另有武谷嘉之對共生社會論的回顧，對共生概念與研究史做了概述式整理（2017）。在公共哲學方面，這類研究則少之又少，金泰昌所做的回顧有助於了解日本公共哲學運動的整體面貌，但並非對於日本公共哲學運動進行學術性研究（金泰昌，2009）。

有趣的是，我們在中文學界反而可見分析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研究：日本公共哲學共働研究所在臺灣舉辦研討會之際，江宜樺撰文介紹

---

3 其他眾多學校採用「共生」一詞的案例可參照（竹村牧男，2006：1-5）。

4 其研討會的成果後來出版爲《爲共生哲學》（共生の哲学のために）（中島隆博、小林康夫，2009）。

5 在日文中 modernity 的翻譯是「近代」，對於日本政治思想來說「近代」一詞是相當關鍵的概念，故本文在日本脈絡下描述 modernity 時使用「近代」一詞，而在其他一般脈絡中使用「現代性」一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本公共哲學運動，進而指出跟西方公共哲學的異同（2005：58-62）；東京大學共生國際哲學研究中心在臺灣舉辦研討會之際，佐藤將之也以中文撰寫介紹共生思想的文章，並分析共生概念的思想脈絡與特質（2009：24-30）；在中國大陸方面，日本哲學的研究者卞崇道在與尾關周二的交流中吸收共生概念，介紹日本共生思想的同時，將共生當作理解近代日本哲學的關鍵概念（卞崇道，2008a；尾關周二著，卞崇道等譯，1996：187）。卞崇道亦擔任東京大學「公共哲學」套書的翻譯者，撰寫過簡要的介紹文（2008b）。林美茂也同樣擔任「公共哲學」套書的翻譯者，深入介紹日本公共哲學的特質，並探索公共哲學的意義（2007；2009）。[6] 以上研究都屬於最早在中文學界介紹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文獻，因此其論述方式基本上是概說性的。可惜的是，後續並沒有出現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析日本公共哲學或共生思想的學術性研究。[7] 本文則是其一種嘗試。

爲了深入了解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特徵，本文擬在同一個架構中討論兩者。本文之所以如此安排，首先是因爲雙方的提倡者時常使用對方的概念，也就是，他們自己意識到兩種概念的理念相當接近，例如：金泰昌認爲，「『共生』已成爲一個新的時代要求」（金泰昌，2009：1）；井上達夫於 1999 年出版《對他者的自由：作為公共性哲學的自由主義》（他者への自由：公共性の哲学としてのリベラリズム），將「共生」與「公共」都當作自身思想的關鍵概念；黑川紀章認爲日本的都市面臨的問題是缺乏公共精神（2006a：65）。可見，公共與共生概念具有互相通用的一面。

除了概念使用上的理由之外，更爲重要的是，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中可見共同的問題意識與思想特質。其特徵在「共」字中呈現，故我們可以將它稱爲「共」思想或「共」理念。不過，如果以一般所使用的概念來指稱，我們亦可將它稱爲「多元論」。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討論的議題相當廣泛，論者的立場也並不一致，例如，大部分的論者屬於自由民主左派，但黑川、

6　卞崇道與林美茂的論文合併部分內容後，當作套書的「總序」附錄在中譯本中。

7　在中國大陸，共生思想有進一步的發展。胡守鈞、任曉等人在上海積極推動「共生」概念，甚至在「共生」概念之下成立上海學派（任曉，2015）。他們有提及黑川紀章、尾關周二的共生思想（任曉，2015：13），但是並非在黑川與尾關的討論上進一步展開論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井上等人的立場並不相同，因此其內部亦出現思想立場的衝突。然而，本文認爲，從多元論的角度分析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論時，我們能看出這些思想潮流背後存在的共同點。鑒於此，本文以多元論爲主軸，從政治思想的視角，針對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進行分析。之所以本文採取政治思想的視角，是因爲對政治思想來說，多元是最爲根本的議題：在人類社會中多元性是一種事實，每個人的利益或價值不同，所以發生衝突。因此，政治思想的基本課題是，在多元衝突的狀態中如何建構秩序。假如理想的秩序也是多元的，那麼，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多元論如何提出多元理念？他們如何提出建立理想多元秩序的方法？回答這些問題，是多元論的關鍵所在，故在這些理論關懷之下，本文探析現代日本多元論的特徵。

本文首先於第貳節探討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多元論被提出來的思想脈絡以及其基本理念；多元的反面是排除，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多元論中可見極爲反對排除原理的堅持，故本文於第參節分析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所討論的反排除原理；在這些理念之下，如何實現多元秩序乃是作爲政治思想的多元論最爲關鍵的問題，故本文於第肆節探析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中可見的實現多元理念的方法；最後在第伍節的結論，總結日本多元論的特徵。多元性是當今日本自由民主派極力提倡並維護的價值，故我們透過以上分析，可窺見 90 年代以後日本自由民主思想的特徵。

貳、多元理念的提出

一、思想脈絡

進入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多元論的分析之前，在此首先論述 90 年代後多元論在日本流行的思想脈絡。就大背景而言，黑川紀章很早就預測即將發生地球規模的典範轉換，其特徵有資訊化社會、移動社會等，在這樣嚴苛的競爭時代中，必定出現強烈的民族文化認同問題，進而導致對立與衝突。共生思想就是在這種時代尋找全新多元秩序的思想（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18-36）。作爲公共哲學在日本流行的原因，林美茂指出兩個原因：第一點是全球化，此觀點與黑川一致；第二點是日本民族以及日本學者的內在素質（林美茂，2007：10-13；2009：18-19）。林美茂爲了解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釋歐美國家與日本的差異提出第二個原因，但是，文化詮釋途徑無法解釋爲何不是其他思想流派而是公共哲學在那個時間點流行。全球化的外在脈絡和日本國內的內在脈絡確實同時存在，但是爲了深入了解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特徵，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戰後日本的內在思想脈絡。

另外，就公共哲學而言，我們也無法忽略日本公共哲學與西方公共哲學的關聯。在西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早在 1955 年出版過以公共哲學爲書名的專著，鄂蘭（Hannah Arendt）以及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關於公共領域的討論也早於日本公共哲學的流行。日本學者討論公共哲學之際時常論及西方公共哲學的討論，雖然也有論者強調日本公共哲學與西方公共哲學的差異，[8] 但日本公共哲學顯然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公共哲學的影響。然而，在日本學者借用西方學者的討論而展開的論述中，我們很難看出日本公共哲學的獨特性。就本文的論點而言，比起兩者之間的影響關係，更爲重要的是，兩者都以現代社會必須面臨的問題爲討論的出發點，即：扼殺多元性的國家主義之興起。納粹的法西斯主義與蘇聯的極權主義是西方公共哲學興起的重要背景，而在日本，對戰爭時期軍國主義的反思是戰後日本政治思想的基本問題意識。我們從此角度探討內在思想脈絡時，能夠進一步理解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於 90 年代流行的原因。

作爲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日本公共哲學強烈批判的是戰爭時期出現的口號「滅私奉公」，克服「滅私奉公」就成爲日本公共哲學的出發點。我們必須了解的是，在日文的語感中，「公」字具有濃厚的「國家、政府」含義。溝口雄三在《中國的公與私》（中国の公と私）中討論中國的公私概念時，指出：相較於中國的公私概念具有公正與偏邪的倫理性，日本的「公」概念則在只代表國家、社會、全體等意義，不具有任何倫理性（溝口雄三著，鄭靜譯，2011：9-10）。渡邊浩也分析江戶時期的「公」（おおやけ）概念而同樣指出，在此概念中沒有倫理意涵，而僅指權力上的大小強弱關係（渡邊浩，2009：164）。由於日本的公概念具有如此的形象，「滅私奉公」意味著爲國家犧牲個體，頗有國家主義色彩。如此一來，戰後日本政治思

8　金泰昌參與在劍橋大學和哈佛大學舉辦的研討會後，強烈感受到日本公共哲學與西方公共哲學的差異，進而將之歸納爲六個面向（金泰昌，2009：466-468）。

臺灣人文學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想以對抗這種國家主義意義的「公」爲基本議題而開展，丸山眞男無疑是其最具代表性思想家。就現代性的要件來看，近代日本最後走向軍國主義的原因，可解釋爲日本尚未建立獨立自主的「個人」，因此丸山爲了對抗國家主義的一元論，強調個體的重要性，進而提出近代二元論的公私觀，這就成爲戰後日本自由主義的基本論調（小林正彌，2009：124）。小林正彌將丸山視爲日本公共哲學的代表性理論家，而認爲正如桑德爾（Michael Sandel）描繪自由主義公共哲學與共和主義公共哲學的對抗關係，在戰後日本亦可見保守公共哲學與革新公共哲學的對立。丸山建立的革新公共哲學堅守民主主義與和平主義，至今依然成功阻止修改憲法，由此可見對於現實也產生一定的影響（小林正彌，2003：3-4）。

然而，除了對抗「公＝國家」的基本問題之外，大約 80 年代以後開始出現另外一種問題：於 60 年代經歷暴風雨般的學運風潮後，政治冷感的風氣開始瀰漫於日本社會，追求經濟發展與強調個人的思潮反而造成「滅公奉私」的風潮（日高六郎，1980：75-92）。80 年代的日本被視爲「私生活主義」蔓延的狀態，不僅不關心國家議題，中間團體也衰退（佐佐木毅等，2003：17、19），價值判斷上「相對主義」流行（吉田夏彥，1977：7-24），倫理觀崩潰。保守主義者佐伯啓思批判戰後日本的思想風潮時指出，倫理觀的崩潰並不意味著不道德行爲的出現，而是無法對不道德行爲進行價值判斷，這種相對主義是重視自由的思潮所致（佐伯啓思，2009：161、164）。直到 90 年代，隨機殺人事件、奧姆眞理教事件等「虛無的個人」導致的事件震撼日本社會，左右派兩邊陣營的知識份子深感危機。在此脈絡下出現的就是右傾化現象。金泰昌明確指出此點：「當今日本社會的心理基礎，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滅私奉公』轉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滅公奉私』，一些對此抱有危機意識的人們，強烈要求進行『公』的重建，積極開展將其作爲『國家意識再確立』的運動」（金泰昌，2009：2）。齋藤純一、小林正彌等人也強調日本公共哲學運動興起的背後有國家主義言論的興起，共生思想論者花崎皋平也有同樣的問題意識，只是，小林坦承國家主義者對戰後日本的批判「擊中要害」，此乃戰後日本政治理論的「思想盲點」（小林正彌，2009：129、135；花崎皋平，2002：3-33；齋藤純一，2009：117）。

除了公私問題之外，「1970 年典範轉換」也是日本多元論盛行的重要背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景。1970 年典範轉換意味著，日本新左派的主題由工人無產階級轉爲少數族群，從此以後，雖然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公民運動，但是過去被忽略的少數族群就成爲日本社會運動的重要主題（小熊英二，2009：262）。少數族群之所以過去被忽略，一方面是因爲馬克思主義將工人階級當作革命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是因爲國族主義（nationalism）[9] 強調內部的統一性。因此，重視少數族群的思潮自然含有對抗國族主義的一面。花崎皋平是重視少數族群的共生思想論者，他的思想中可見濃厚的反國族主義意識。他強調，1980 年代以後煽動日本國族意識的意識形態興起，這就成爲思考共生問題的起點（1993：27）。共生思想繼承 1970 年典範轉換後的問題意識，以「共生社會」、「多文化共生」、「共生學」等名稱，90 年代後廣爲流行。這些用語對「共生」概念的定義基本上一致，即：與「他者」（異物）建立良性關係。對於多數者而言，少數者往往是無法理解的他者，因而產生強烈的排他性。然而，身爲人類社會的共同成員，多數者與少數者必須共同生活，建立良性的關係，這就是共生多元論的基本問題意識。如果將他者之間的關係套用到國際關係上，就會出現反西方中心主義的國際多元秩序論，黑川紀章則在此層次上積極提倡共生思想。

從以上的論述得知，雖然各自著重的論點不同，但就原理來看，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多元論興起的主要思想脈絡有二：首先是抵抗「一」的問題意識。在此所說的「一」意味著，對內產生強烈凝聚力與壓迫的國族國家、只顧自己而失去自己的虛無個人、以及對外發動侵略的以西方中心主義爲首的帝國主義，日本多元論極力抵抗這些現象；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意識是「他者」。歷來被認爲是同質社會的日本，在 1970 年典範轉換以及全球化的趨勢之下，開始面對國內少數族群以及與自己不同的異國文化，因而如何與他者重建關係，就成爲日本自由民主派的重要課題。鑒於此，以下從此兩方面探討日本多元論的理念。

---

[9] 爲區分近代以來興起的 nation 和具有 ethnicity 意義的族群，本文將前者翻譯爲「國族」而將後者翻譯爲「民族」，故將 nation state 翻譯爲「國族國家」。

臺灣人文與宗教期刊資料庫

二、抵抗「一」的原理

建構國族國家是現代化過程中無可避免的現象，理論上國族可容納各種民族，並非國族國家必然扼殺多元性。然而，我們也無法否認國族國家本質上帶有強烈的凝聚力，經歷二戰時期軍國主義的日本，對於國族國家的這種力量相當敏感，「個人」無法單獨成爲對抗國族國家的堡壘時，日本公共哲學論者感到需要突破公私二元論的必要性。爲解決「滅私奉公」與「滅公奉私」的兩難問題，日本公共哲學運動提出的解方是思維上的轉換，亦即：由「公－私」二元論轉爲「公－公共－私」的三元論：

> 那麼，徹底批判滅私奉公思想的同時，克服這樣的公私二元論的對策是什麼呢？關於此問題，現在的公共哲學所提出的方案或根本理念是，將「政府的公／民（人們）的公共／私領域」視爲具有相關性的關係，進而全面主張「活私開公」理念的「個人－社會」觀……在這樣的智性並社會性狀況中，必須區分具有濃厚的「官」或 official 意味的「以政府爲負責單位的公」和「民或人們支持的公共」，這就是本書最爲重要的主張之一。幸好，別於英文中的 public，日文能夠用詞彙區分「公」和「公共」。利用此優點大膽區分兩者，以此進一步正確地認識、診斷並改善公私二元論所無法掌握的政治、法律、經濟、教育、科學技術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社會現象之實際面貌，這就是日本公共哲學的根本主張。（山脇直司，2004：35-36）

此三元論的關鍵在於區分「公」與「公共」，其實「公共」一詞原本也在日文中往往意味著國家及政府（山岡龍一、齋藤純一，2017：11），因此，簡言之，日本公共哲學的主張是，在「公」（國家）與「私」（個人）之外，建立「公共」領域。這種公共領域實際上等同於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基礎也是獨立自主的個人，故山脇借用金泰昌提倡的「活私開公」口號，主張理想的「個人－社會」觀。小林正彌將這種公共哲學又稱爲「新公共主義」（neo-republicanism），進而爲活化日本公民社會，積極引進西方社群主義與共和主義（小林正彌，2009；小林正彌、菊池理夫，2012；田中秀夫、山脇直司：2006）。在日本研究公共哲學的代表性學者齋藤純一也說，面對

臺灣人文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全球化的肆虐，我們只能採取建立國族主義抑或公民社會的方式對抗，而雖然他對於公民社會本身帶有的問題有所自覺，但依然認爲建立公民社會是我們可取的方法（2000：83-88）。如此看來，日本公共哲學的多元論並沒有如他們所說地那樣新穎，實際上它意味著主張建立公民社會的運動。回顧日本的公民運動，60年安保鬥爭，反越戰運動之際不少知識份子感受到公民運動在日本的萌芽，丸山眞男的弟子松下圭一於 1966 年發表〈「公民」在現代的可能性〉（＜市民＞的人間型の現代的可能性）而指出，在大眾化的日本社會中，具有自發性的公民再度興起（1994）。若於 60 年代的日本眞有過公民社會的萌芽，爲了抵抗國家主義的復興，日本公共哲學便利用多元論試圖復甦公民運動。

建立公民社會等同於追求現代性，就此點來看，日本公共哲學並無獨特之處。然而，有趣的是，他們應用三元思維強調日本獨特的思想特徵。例如，金泰昌主張日本公共哲學是注重「中、間、和」的哲學（金泰昌，2010：10-12），公共哲學與日本文化的特質在三元思維的脈絡中被連接在一起。以同樣強調日本獨特性的方式進一步展開東西文化論的就是黑川紀章。

黑川認爲，西方思想的根源有排除曖昧領域的二元思維，如黑白明瞭的契約、近代工業社會中的機械原理等（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45、200）。身爲建築師，黑川在東方建築中看見了與西方建築不同的三元思維。例如，他舉日本傳統建築的「廊台」（日文：縁側）的例子。廊台兼具走廊、陽台、出入口、會客空間等多種功能，而更爲重要的是，無法簡單劃分廊台是室內或室外，它兼具室內與室外的意義。黑川由此引導出西方與日本的思維差異：

> 如果不怕誤解的話，我們或許可以說西方與日本在空間上的差異是〈對立空間〉與〈共生空間〉之間的差異。西方建築通過征服自然，形成與自然對立。正因爲如此，區分內部與外部的牆的意義尤爲重要。而日本的空間則融合於自然，通過與自然的共色、協調、一體化而成立……我想，〈這種有利於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內外二元論所不能解釋的空間，不能用牆壁隔開的空間，難道就不能引入到現代建築之中去麼？〉這正好與我的中間領域的構思聯繫在一起。（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184-1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黑川紀章透過日本建築的特色分析出兼具多元功能的「曖昧性」的意義，對他而言，這種「中間領域」的存在是多元共生的秩序成立的要件，因爲透過中間領域的媒介，異物之間沒必要完美結合，在保留矛盾的情況下能夠共生。這也意味著不同於機械原理的生命原理，以多元生命原理克服二元機械原理，是黑川思想的重點之一（1994：32）。

從以上的論述得知，黑川主張以三元克服二元，具有解構西方現代性的意味。黑川並非否定現代性本身，他有意繼承現代性當中的個體自我認同與抽象思維（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93、351），然而，他極力反對扼殺多元性的西方中心主義。也就是，在日本多元論提出的三元論當中，可見抵抗「一＝西方中心主義」的面向。而爲了抵抗西方中心主義，黑川的論述中時常可見強調「日本性」的論點，「聖域論」即是其象徵。

黑川爲共生概念下定義時強調，共生是包含矛盾對立的關係（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6），這就意味著共生不追求多元性融合爲一，差異性要被保留並尊重。換言之，此差異就是多元性的依據，即便個性中含有不可理喻或無法理解之處，我們也必須給予尊重。黑川將此種個體的獨特性稱爲聖域：「聖域論對各國、各民族、各種各樣的文化、各種企業、各種各樣的人來說，都存在」（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223）。我們在此明顯可見黑川多元論的特質，即：尊重每個個體的獨特性。就此意義上，爲了對抗西方中心主義，黑川強調日本的獨特性。

然而，對將反國族國家作爲基本主張的日本自由民主左派來說，黑川的聖域論並不容易接受。黑川在討論聖域論之際提出，日本的聖域是天皇制、稻作、相撲、歌舞伎、茶道（數奇屋建築）（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224）。黑川利用聖域論表明維護天皇制的立場，就成爲黑川遭受其他左派多元論者批判的很大原因。如前所述，尾關周二將黑川的共生思想分類爲具有「前近代」性質的「聖域共生論」，進而批判說，以「聖域」概念一開始就否定互相理解的溝通，即是前近代的保守類型（2002：15）。平心而論，尾關的批評是日本左派的情緒性表現，對於黑川思想的誤解亦很深。聖域論並不是否定溝通的理論，反之，它是爲了建立單靠溝通無法建立的良性關係，被提出來的理論。聖域論的意義在於：「暫時保留下所謂對立的、異質的原則，去找出些共通的東西，即使這些東西只佔 10%，其中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也有可以創造出像共通的第三領域」（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222）。可見，聖域論與中間領域論是黑川共生思想的關鍵，每個個體保留聖域的情況下能夠進行溝通並建立良性關係，是因爲中間領域的存在。[10] 反過來說，不承認聖域等於扼殺多元性，黑川是爲了抵抗這種意義的一元論，提倡維護個體的聖域論的，在此思維特質上，他的思想與其他日本多元論者並無二致。[11]

乍看之下，黑川的聖域論或許像是國族主義的表現，但其實他的思想反而具有克服現代性的後現代思想性質（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5、317）。至少黑川紀章絕不接受國族國家的一元性質，實際上，與其他多元論者同樣，黑川也強調尊重少數民族固有文化的重要性（2006b：259），黑川強調日本性，並不等同於他忽略少數族群。本文由此認爲，在「抵抗國族國家」與「強調日本性」這樣看似矛盾的論述中，實際上可見日本多元論的相同思想特質，亦即：抵抗「一」的問題意識。

三、「他者」的視角

日本多元論極力抵抗「一」，但是這並不代表日本是多元的社會，反之，同質性往往被視爲日本社會的特質。身爲外國學者，金泰昌帶領日本公共哲學運動的同時，觀察到日本社會的三點特質：首先，在日本人的認識方式中可見「主客合一」的特質，喜愛融合爲一的思維；其次，日本社會和日本人的意識中，「他者」幾乎不存在，對不同的意見具有敵意；最後，在日本，對話只不過是儀式，個人意見往往無法好好表達（金泰昌，2009：457-458）。以上三點都表示日本社會不接受多元性的特質，在這種社會中，異端份子和少數族群容易被壓抑。正因爲現實中的日本社會是如此，所以在思想層次上出現不斷強調「他者」意義的多元論。其中，提出最有理論性討論的是井上達夫。

---

[10] 黑川紀章強調個體的重要性，在他年輕時提出的「膠囊宣言」（カプセル宣言）中亦可見。黑川年輕時推動「新陳代謝主義」（metabolism）運動而馳名，他的基本構想是，爲了反對近代工業的無機建築，在建築中納入生命的觀點。在此脈絡下，黑川提出「膠囊宣言」，在宣言中不斷強調個人的重要性（1969：143-173）。

[11] 尾關周二後來轉爲肯定聖域論的意義（2015：13）。

臺灣人文社會研究期刊資料庫

井上達夫是最早提倡「共生」概念的人之一，他認爲共生概念被提出來的原因是：「在調和或一體性的幻想崩壞而曾經被壓抑或隱藏的對立爆發的狀況下，探索新的共存架構」（1998：344），可見直視多元性的事實而探索新的社會架構，是井上的基本問題意識。而身爲自由主義者，更爲直接的問題意識是，從相對主義的思潮中拯救自由主義（1986：iv）。對井上而言，眞正的自由主義並不帶來相對主義，也不要求國家的價值中立，而區分「可當作決策依據的價值」與「不可當作決策依據的價值」，才是自由主義的課題（1999：12-13）。爲此需要做的是，在概念上區分「正義」與「善」。井上達夫的討論深受羅爾斯（John Rawls）的影響，羅爾斯將此區分稱爲「正義對於善的優先原則」，但井上認爲此講法令人誤以爲實現正義比追求善更爲重要。此理論架構的重點在於，在共同的正義之上，各自追求多元的善，故井上將之形容爲「正義的基底性」（1999：12）。無論如何取名，顯然這樣的理論架構與羅爾斯相同。但是，井上爲了解釋此理論架構的含義，提出獨特的比喻，即：作爲正義的會話。

井上達夫的比喻，深受著名保守主義者歐克夏（Michael Oakeshott）的影響。他引用歐克夏有關「統一體」（universitas）與「社交體」（societas）的討論，指出：相對於統一體預設某種共同目的，社交體則只共享如何追求目的的「品行規範」（norms of civil conduct），是形式上聯合體。在社交體當中，爲政者該扮演的角色是宴會中的司儀，他並不需要強迫賓客（convives）[12] 接受特定的價值（1986：241-242）。不過，以會話爲典範的社交體並非沒有任何規範，宴會中依然需要「會話的禮儀」（decorum of conversation）（1986：256），在所有賓客能接受的禮儀規範之上，賓客才能盡情享受宴會。可見，井上反對扼殺多元性的統一體而認同社交體，以會話的禮儀（＝正義的基

[12] 井上達夫將歐克夏使用的 convives 翻譯爲「共生者」，因而將 conviviality 當作共生的英譯詞（1986：246）。在法國，於 2013 年在伊利奇（Ivan Illich）思想的影響之下出現 Manifeste Convivialiste，日文將之翻譯爲「共生主義宣言」（西川潤、Marc Humbert, 2017），這是同樣將 conviviality 翻譯爲共生的例子。作爲「共生」的英譯詞，尚有 symbiosis、co-viviance、living together 等（佐藤將之，2009：27），共生社會體系學會則認爲沒有適當的英譯詞，故直接使用日文發音 kyosei（武谷嘉之，2017：21）。本文採用共生社會體系學會的翻譯，將共生思想英譯爲 philosophy of kyosei。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底性）爲基本規範，允許各自講述自身的生命故事（＝多元善）。對井上而言，如此才能重建他者之間的共生關係，這也等於實現公共性，井上所認爲的自由主義的意義便在此。

井上利用西方政治哲學的理論提供在日本思考他者之間多元秩序的方法。當時這類討論在日本不多見，故引起很大的反響，尤其成爲後續共生論者無法忽略的討論。然而，這些論者肯定井上的問題意識的同時，也提出一些批判意見。例如，高橋舞從教育學的角度回顧共生思想之際，勾勒出井上共生論與花崎皋平共生論的對比（2009：90-94、100-106）。花崎皋平原先是北海道大學教授，但參與並支持 60 年代興起的反越戰運動等之後，辭職並成爲著名的社會運動人士。他接觸阿依努之後，明確意識到自己心中的歧視，因而開始從少數族群的角度思考歧視問題（1993：177-178）。花崎同意他者之間建立對等關係，但是，井上的理論預設賓客之間的對等關係，而沒有預設現實的賓客之間存在的不對稱關係。在不對稱關係的他者之間預設對等關係，反而會隱藏其中的壓迫關係。多數族群和少數族群眞能成爲宴會中的對等賓客？花崎認爲，掌握關係中的不對稱性而開啓對稱關係，才是反歧視運動的原理（1993：165）。花崎的這種共生思想就成爲另外一股共生思想論的潮流（高橋舞，2009：100）。

尾關周二是另一位對井上提出批判的共生思想論者。尾關關注井上理論與競爭的關係。井上提出的一個論點是，爲了實現「富裕的關係」（関係の豊かさ），他者之間亦需要刺激相互啓發的競爭（competition），但這不同於追求單一目標的競爭（emulation）。假如排除少數者，多數者就失去受啓發的重要機會。就此意義而言，共生並非「和諧音」（symphony），而是「不和諧音」（cacophony），有如此的認知才能打破同質化社會（井上達夫等，1992：16-19、26、97、100）。尾關周二批判此論點，認爲在社會保障不足而互助關係薄弱的社會中，這種競爭將實際上變質爲「生存競爭」，在競爭社會中強者談「共生」時，在形式平等的名義之下，壓抑關係往往被隱藏，進而將井上的共生論批判爲具有「近代」性質的「競爭共生論」（2002：17、19）。井上確實論及競爭的正面意義，但這是井上理論中的部分論點而已，故尾關將它當作描述井上共生思想論的名稱，會有過於武斷的疑慮。不過，尾關試圖批判的論點是，井上的論法會隱藏現實中存在的強者與弱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之間不對等關係，如此無法眞正建立他者之間的良性關係，此點與花崎對井上的批判一致。

在後續的日本多元論當中，並沒有出現如井上般從理論的角度展開多元論的研究，而他們更爲關注的是現實社會中的具體不對等關係，就此點來看，花崎與尾關的觀點對後代的影響更大。如社會契約論般，井上的理論將「沒有差異」的個體當作出發點，但是現實中差異是存在的，而且如寶月誠所說，「共生社會」並非否定差異本身，而是試圖解決差異帶來的不平等關係（2017：2），故後續的多元論者似乎不太願意接受消除差異性的抽象化理論。爲了將共生思想的討論拉回現實層面，後續的共生思想論者經常關注具體的少數族群議題，如阿依努、在日朝鮮・韓國人、身心障礙者、性別問題等（岡本智周、丹治恭子，2016；河森正人等，2016；崔勝久、加藤千香子，2008；菅沼隆等，2014）。這些研究致力於分析具體的權力不對等現象，揭開歧視結構的眞面目，讓人明確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

由以上的論述得知，如何認知他者並與他者建立良性關係，也是日本的多元論極爲關注的議題。在同質社會中，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並不明顯，但這並不代表少數族群不存在，而只是過去被壓抑而沒有浮現上來而已。因此，日本多元論致力於挖掘曾經被忽略的少數族群問題，並提倡直視多元事實，近年大量出現的多元論多半屬於此類。就此意義上，日本的多元論不僅是學術研究，也有濃厚的社會運動性質。

參、妨礙多元理念的根源：排除原理

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具有理論討論與社會運動的面向，查閱他們的大量著作就能得知，大部分的研究屬於實踐對話或揭開少數族群議題的類型，理論性討論並非主流。然而，本文認爲關注理論面向時，能夠進一步了解日本多元論的特質，故在本節將分析焦點放在日本多元論極力批判的排除原理上，進而指出日本多元論背後可見的問題意識。

一、辯證法思維與排除原理

如上文所述，日本公共哲學具有重建公民社會的一面。然而，依西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公共哲學探索公民社會時，公民社會與多元論之間出現一個難題，即：公民社會的排他性。西方公共哲學的基本危機意識在於近代社會中「大眾」的崛起，最早使用公共哲學一詞的李普曼處處強調大眾的崛起造成的問題，如：「什麼地方群眾的意見支配了政府，[13] 什麼地方就會發生眞正權能的可怕錯亂」（Lippmann 著，任曉譯，2020：16）。鄂蘭討論公共領域之際，也論及大眾社會的問題：「使得以身爲社會性動物的人爲最高統治者、並且保障全球性的種屬存續的大眾社會，可能同時讓人性毀滅之虞」（Arendt 著，林宏濤譯，2015：99）。沒有自主性的大眾容易導致極權主義、民粹主義等陷害公民社會的現象，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之下，西方公民社會論往往帶有菁英主義的色彩。但是，菁英主義必然具備排除機制，這一點跟以包容性爲核心價值的多元論之間產生緊張關係。齋藤純一指出，近年的公民社會論傾向於將公民社會描述爲和諧的空間，但是，公民（civil）必然排除不符合公民標準（uncivil）的人，公民社會也未能避免排除的機制（齋藤純一，2009：115-116）。因此，如何構想反排除的公民社會，就成爲日本多元論面對的難題。

從多元論的角度探析排除原理之際，日本多元論者注意到在西方思想中可見的辯證法思維。例如，黑川紀章認爲現代性有三個原理特徵，即：基於工業化的普遍主義、基於功能的分離主義，以及等級秩序的統一原理（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76），而作爲其根本原理之一，指出辯證法含有的排他性：

> 在西方，爲了超越二元論和二項對立，有對兩者揚棄（aufheben）的辯證法。在這種情況下，對立的二項會被統一成爲一個東西，或是征服對手，排除對立的部分。與之相對，共生思想在包含著對立的同時，還創造出兩者的連接關係。（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199）

對黑川而言，由於西方思想具有濃厚的辯證法思維，所以曖昧的中間領域被輕視，在國族國家或帝國主義中可見的權力中心結構，也是這種追求「一」的辯證法思維的結果。作爲這種西方思維的比喻，黑川舉西方的「廣

[13] 「群眾」的原文是 ma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場」與東方的「道路」的差異：「東方城市的設施是沿著『路』和『道』分散設置的，『路』和『道』具有城市公共空間的功能，同時也起到貫通各個建築的作用。而與此相對，在希臘城市的中心部具有公共空間功用的卻是廣場」（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191）。西方的廣場是權力的象徵，道路只有通往權力中心的意義。但是，東方的道路兼具公共空間，在此可見東方與西方的思維差異（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194）。透過此比喻，黑川指出東西思維結構的差異，一言以蔽之，對黑川而言，源自西方思想的現代性本質上具備排除原理。

井上達夫同樣批判辯證法思維。如前文所述，井上將「會話」當作多元秩序的比喻，這是因爲他要批判來自辯證法思維的「溝通」理念。對井上而言，溝通與會話的意義不同，溝通預設該達成的某種目標，但會話卻沒有。換言之，如辯證法，溝通是將不同的見解（多）彙整爲「共識」（一）的方式，這猶如某種特定的善征服其他善的過程。對井上而言，這是一種暴力：

> 從對他者開放的公共性這個視點來看，所謂「協商一致」，不如說是隱藏他者問題……在必須作出集體決定時，如果按這個原理進行，則只要有少數的反對派，事情就無法決定下來。這時會有人對少數派暗地施加壓力使他們贊同，會出現所謂的事前溝通，甚至是露骨的恐嚇。（井上達夫，2009：178-179）

井上的描述似乎反映著在日本社會中常見的場景，但他從中看見共識論具備的暴力性質，如果預設共識，最終必然導致對少數者的暴力，因此不能將溝通當作正義的原理。井上在以溝通與共識爲理想的現代原理中看出排除原理的暴力。

二、反菁英主義

那麼，如何實現不帶有排他性的公民社會？探討此問題的是井上達夫的盟友桂木隆夫。面臨 90 年代後自由民主在日本的危機，桂木隆夫強調討論公共哲學的目的在於，擁護民主主義和市場支撐的自由社會（2005：iii）。他將形成公共性的方式區分爲「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方式，而在此區分中，他強烈批判屬於「由上而下」方式的菁英主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理性的公民經過合意形成公民政府」的想法，乍看之下像是呈現由下形成公共性的理想型態，但是，實際上其中往往含有啓蒙專制主義式思維，如能夠理性判斷的知識菁英啓蒙大眾而引導到正確判斷一般，這種思維容易連接到由上實現公共性的思考」。（2005：155）

可見桂木隆夫也相當防範一般公民社會論含有的菁英主義。顯然，他重視的是「由下而上」的方式，但他特別強調「由下而上」的公共性需要包含「作爲非意圖性結果的合意形成」（2005：155），因爲如此才能打破理性共識論的排除原理。桂木使用「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理論來討論這種意義的公共性。

囚徒困境所說的困境是，在互相不信任的情況下，各自依據「理性」追求自己利益的結果，並不會帶來雙方的最佳利益。換言之，與無法信賴的他者共同形成利益共同體時，這個社會無法實現最佳的公共利益。這就暗示，在規模龐大的現代社會中，大部分的人互不認識，若缺乏信任的機制，便無法依據理性實現社會的最佳狀態。然而，桂木注意到另一種囚徒困境的實驗：佛拉德（Merrill Flood）和德萊歇（Melvin Dresher）重複實驗 100 次的囚徒困境賽局的結果，居然就出現 68 次的合作，這個結果與一般我們所理解的一次性囚徒困境賽局完全不同（Poundstone 著，葉家興譯，2019：158-167）。桂木隆夫因而認爲，爲了與不認識的他者形成合作關係，除了理性之外，也需要好奇心、勇氣等不同因素，而爲了刺激這些情感因素，正如測試 100 次才出現多次合作結果般，我們的社會需要創造賽局持續的條件（2005：127、140）。他主張，從此角度重新思考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時，兩者就成爲公共哲學極力維護的對象。

利用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機制來實現不排除任何人的公民社會，是桂木隆夫的主要構想，因此在他的社會藍圖中，大眾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培育知識菁英的同時，活化知識大眾的審議，是自由代議民主制該有的樣子」（2005：192）。他並非單方面批判菁英，他重視的是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平衡，故菁英、一般大眾與知識大眾，都是實現公共性的主要成員，桂木將之稱爲「相補民主主義」（2005：188、191）。江宜樺分析日本與西方公共哲學的異同時指出，相較於 Lippmann 強調菁英的領導作用，日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公共哲學運動則明白採取平等主義的行動策略（2005：62）。依桂木的討論來看，我們確實可見平等主義的特質。只是，相較於克服菁英主義公民社會的宏大志向，桂木最終提出的方案相當單純，簡言之，「大家一起來」是反排除原理的方法。這種討論揭示著日本政治思想不成熟之處。不過，如果堅持反對排除的原理，除了提出涵蓋一切的思想藍圖，還會有哪些方法？從這樣的角度檢視日本的多元論時，我們發現他們時常提及多元性之上的整體性概念。也就是，透過整體性概念，描繪不排除任何個體的多元秩序藍圖。

三、全體論

小林正彌使用「全體論」的概念提出反排除原理的理想藍圖。小林將全體與個人的關係區分爲兩者：一種是原子化個人導致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日文：全體主義），而另一種是小林所說的全體論。在他的全體論中，個人與超越國家的全體（如自然、上帝等）連接在一起，小林正彌將這種個人的特質稱爲「全體論的自己」（holistic self）（2010：73-74）。在此可見其一方面批判國族國家，而另一方面拯救虛無個人的問題意識，他認爲爲了培養多元社會中的理想人格，光主張個人主義是不足夠的，還需要提倡與他者連接在一起的全體論。爲了實現這種意義的全體論，小林主張的就是「友愛」概念。

小林在《友愛革命是否可能：從公共哲學的角度思考》（友愛革命は可能か：公共哲学から考える）中主張友愛概念的重要性，而書中區分廣義的友愛與狹義的友愛：狹義的友愛像是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說的 philia，是在同質社群的友誼之間成立的愛，其中不會有他者；相較於此，廣義的友愛是類似同胞愛或兄弟愛，能推及至他者的愛，也等於在法國革命中被提出的友愛（fraternity）。就此意義上，小林正彌主張廣義的友愛才能成爲全體論的精神原理，也可成爲內含他者的多元政治論之基礎（2010：152-153）。可見，小林的全體論與友愛概念是在反對排除原理的問題意識之下被提出來的。[14]

[14] 小林發現，自己原先抱有的想法與凱勒奇（Richard Nikolaus von Coudenhove-Kalergi）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其他日本多元論者的主張中，亦可見這種強調高層次整體性概念的論述。例如，山脇爲了強調整體與個體的連結，合併 global 和 local 而提倡 glocal 的概念：[15]

> 21 世紀的公共哲學首先應該擺脫原有的國民主義公共哲學；人們在對自己所處狀況的地區性（局部性、現場性）進行充分理解的基礎上，站在世界的高度上相互承認彼此文化的多樣性，達成普遍性的認識和協議；這才能眞正稱之爲「全球－地域公共哲學」。[16]（山脇直司，2009：16）

在此「世界」（global）是整體性的象徵，每個地區（local）的多樣性在世界底下才能實現。這樣的 glocal 概念具有普世主義（cosmopolitanism）的色彩，實際上，山脇認爲 glocal 公共哲學需要將康德的「作爲世界市民的自我」出發點。但是，他同時強調，glocal 的普世主義絕非當今美國新自由主義式的全球化，因爲這種全球化是一種抹殺他者的文化帝國主義（山脇直司，2009：17-18）。

如此看來，爲了建立含有他者存在的多元秩序，現代日本多元論時常呈現「多元性之上的整體性」的思維結構。從日本哲學的脈絡思考這樣的思維結構時，我們不能忽略以西田幾多郎爲代表的京都學派。後期的西田哲學將「世界」當作重要的概念，而西田將現實的世界形容爲「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西田幾多郎著，黃文宏譯注，2006），這就意味著：「現實世界一方面是一個無限的辯證法過程，另方面則是指其內容經常作爲一個整體」（藤田正勝著，林永強譯，2016：110）。西田深受辯證法的影響，但是他

的主張相當一致，也因而與曾任首相及民主黨主席的鳩山由紀夫結緣。自民黨第一任總裁鳩山一郎將凱勒奇於 1937 年出版的 *Totaler Staat – Totaler Mensch*（全體國家、全體的人）從英譯本翻譯爲日文，日文書名爲《自由與人生》（自由と人生），進而將此書最後的主張「友愛」當作鳩山一家的理念。鳩山由紀夫認同此理念而擔任首相之際提倡友愛的政治，小林則全力支持鳩山。此後，鳩山與小林持續交流，吸收社群主義、共和主義等的政治思想，進而於 2019 年成立共和黨（小林正彌，2010：59-104；首藤信彥、鳩山友紀夫，2019）。

15 金泰昌爲了正面看待國族國家的意義，提倡 glonacal（global+nation+local）的概念。不過，山脇認爲，許多少數族群不見得能擁有國族認同，故不使用 glonacal 一詞（2017：25）。

16 「全球－地域公共哲學」是 glocal 公共哲學的翻譯。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所說的世界並非個體融合爲一的場所，與此相反，個體在同一中需要被保留。矛盾不被解消而個體在整體中共存，可見西田與現代日本多元論的思維結構一致。黑川紀章引用西田的盟友鈴木大拙的「即非論理」後如此寫到：

> 在東方的個體（Oriental Individum）世界裡，部分和整體是等價的，個體和超個體（全體）相互矛盾的同時，並不失去自我的同一性，這原本就不是一定要將部分統一到全體之中的金字塔型等級概念。（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102）

黑川並未提及西田，但是這種「矛盾」與「自我的同一性」的講法應該意識到西田哲學。正如黑川爲了解構現代性的原理，極力主張日本文化中可見的多元共生的理念，西田幾多郎在日本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看見矛盾的自我同一世界的自我形成原理，進而主張日本應該由此貢獻於世界（1940：81-82）。雖然西田同時警戒將日本主體化而變爲帝國主義，但是由於現實中出現的是以日本爲盟主（一）的大東亞共榮圈構想，故西田哲學往往被批評爲在思想層次上支持了大東亞戰爭。然而，就西田的思想結構而言，顯然他並非支持將日本主體化的帝國主義（1940：92-93），如同現代日本多元論強烈批判帝國主義。由於篇幅的關係，在此無法深入討論甚爲難解的西田哲學，但是，我們僅關注問題意識與思維結構，就能發現在現代日本多元論的根底可見西田哲學的影子。如小田實所說，日本如何與作爲他者的、無法理解的西方共生，或許是日本多元論的根本問題（1978：70）。就此意義上，西田哲學與京都學派依然是理解現代日本多元論的重要媒介。[17]

肆、多元理念何以實現？

以上分析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中可見的多元論，其主要問題意識在於抵抗國族國家、帝國主義等產生凝聚力或征服他者的「一」的原理，

[17] 東鄉和彥等人討論公共性之際也與西田哲學連接。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在西田哲學與公共性的思想連結下進一步討論外交問題，因爲國際秩序中的外交象徵著「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相關討論請見（東鄉和彥等，2017）。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而堅持反對排除原理，並提倡重視他者的多元理念。至此，作爲政治思想研究，我們必須追問的問題是：這些多元理念如何才能實現？如果缺乏這方面的論述，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淪爲理想主義的口號，他們如何提出具有說服力的實現方法？本節集中討論此問題。只是，需要事先說明的是，雖然多元論的相關著作在日本汗牛充棟，但有意討論實現方法的著作卻極少。因此，本文試圖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分析出邏輯上涉及實現方法的觀點。

首先，我們分析在日本多元論者當中最有理論性討論的井上達夫。井上是明確提倡共生與公共性概念的學者，如上文所述，他展開正義論，是爲了對抗 70 年代以後在日本出現的相對主義風潮，因爲他認爲相對主義破壞自由主義中的主要德目「寬容精神」的基礎（1986：197）。相對主義乍看之下帶來多元性，但是，眞正的多元性在根底處需要共同基礎，否則只會產生虛無的個人，因此井上堅持正義的基底性概念。作爲正義的共同基礎，井上使用「會話」的比喻，正如在會話中各自將禮儀當作共同規範，社會成員也需要這樣的共同規範。如果接受禮儀規範是寬容的表現，我們如何才能實現寬容精神？井上爲此強調的是，「我們是會犯錯的存在」的自覺，亦即，對於自己價值判斷的可謬性要有所自覺（1986：197-198）。這是因爲自以爲是的時候人往往無法寬容於他者，故質疑自己是寬容精神的出發點。作爲實現多元性的方法，這就是井上理論的重點所在。簡言之，在他的理論中，質疑自己的規範性要求，就是實現多元理念的條件。作爲其具體方法，井上主張人們需要測試「反轉可能性」（reversibility），亦即：互換自己與他者的立場，由此檢視某一主張的妥當性（井上達夫，2009：171）。當然，這也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井上也事先預設「人們無法超越自己的視點，故無法完全跟他者轉換視點」的批判。井上達夫對此回應說，「忽略他者視點的視點」和「考慮他者視點的視點」之間依然有品質上的差異，前者只會帶來只顧自己的「自閉性理由」，後者卻能提升到「公共性理由」，我們要關注此兩者的差異（2020：377-378）。也就是，井上知道可謬性的自覺並非萬靈丹，不一定帶來相互理解，但至少這種「自覺」能防止扼殺他者的獨善，將人們引導到會話的場合，由此可成爲實現多元善的基底（1986：198-199）。歸根究柢，即便無法眞正了解他者，懷疑自己的絕對性而試著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資料庫

了解他者的「意志」是實現多元性的關鍵。

這種將個人意志當作最終理論依據的多元論在其他論者中亦可見。例如，黑川紀章爲共生概念下定義時提到，共生是試圖理解對立者的積極關係，也是試圖擴大互相共通領域的關係（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6）。如前文所論，黑川極力反對辯證法式排除原理，故他所主張的共生秩序是，「包括對立與矛盾在內的競爭和緊張的關係」（黑川紀章著，覃力等譯，2008：6）。既然是矛盾關係，混亂和衝突無可避免。依黑川的講法，在混亂中帶來秩序的就是試著理解他者的意志，這就成爲共生的基礎。由此可見，爲了實現多元理念，井上與黑川相當依賴個人意志。

除了個人意志之外，「精神」也是日本多元論者熱愛使用的概念。小林正彌即是其代表性論者。如上文所述，小林提倡「友愛」概念，而作爲其實現方法，他主張「精神革命」（2010：160）。爲了精神革命，小林提倡的具體方法是愛的啓蒙或教育（2010：163）。小林自問「友愛革命是否可能」而提出的回答是：「經由每個人的努力而可能」（2010：251）。透過教育改變人，是自古以來常見的主張，但是人類至今依然未能實現理想的社會，因此小林的講法不免讓人質疑過於理想主義。[18]

以上從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多元論中分析出涉及到實現多元性的論述。基本上，他們都沒有將實現方法當作主要的關懷，故我們只好從他們的論述中探討爲數不多的相關論點。我們發現，他們論及的方法依賴自我質疑、個人意志、透過教育的精神革命等，這就表示，爲了實現多元理念，需要讓從未懷疑自己的人懷疑自己，讓沒有了解他者意志的人發揮意志，或讓原本沒有友愛的人發揮友愛精神。一言以蔽之，在此需要的是「變化」，亦即，透過認知的改變，實現多元理念。爲了改變認知，需要接觸他者而刺激自己的認知，因此，日本多元論者透過大量著作的發表或舉

[18] 於 2001 年發生九一一事件以及其後的反恐戰爭之際，小林馬上組織「公共哲學關係網」（network），試圖重建戰後日本公共哲學的和平主義（公共哲學ネットワーク，2003：7）。小林說：「對戰後日本來說，憲法第九條所象徵的和平主義是佔有『公共哲學』的核心位置」（公共哲學ネットワーク，2003：18），對他而言，這也意味著繼承丸山眞男的精神（公共哲學ネットワーク，2003：310）。如此看來，日本多元論亦有繼承戰後日本絕對和平主義的一面，在此亦可見理想主義的色彩。

臺灣人學期刊資料庫

辦活動，提供接觸他者的機會，試圖藉此改變人們的認知。正如金泰昌所說：「public philosophy 傾注於提出某種正確答案、處方、方針和結論……與此不同，公共哲學致力於發現問題、形成議題與其相互確認以及思想轉換」（金泰昌，2009：468）。如此看來，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並沒有具備任何嶄新的實現方法，其方法極爲單純。

但是，問題不在於單純與否，從政治思想的角度思考時，這種實現方法大有商榷之處。現實的政治社群中常可見「一」的原理，是因爲現實中多元性往往帶來衝突。之所以多元性是衝突的原因，是因爲人有不願意接受異物的本性，故需要借用某種規範建立秩序。也就是，人很難接受他者，是政治思想的出發點。然而，日本的多元論試圖改變人的認知，是一種直接改變人的條件之方法。難道活在現代社會的我們具備進化爲新人類的條件？當然，改變人的內在性是自古以來被當作實現理想社會的途徑，但是，人類歷史證明此種方法相當困難。

再者，將變化當作實現理想社會的條件時，必然面對「可改變認知的人」與「無法改變認知的人」之間的差異。此時，後者是否從理想社會中被排除？若排除，就不符合反排除的理念；若不排除，他們可能成爲破壞多元性的問題根源。一方面提倡依據反排除原理的多元論，另一方面對於自身提及的實現方法沒有自覺，這是日本多元論的嚴重缺點。山脇直司將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關係分爲兩種：一種是「理想的現實主義」（idealistic realism），它意味著，先提出價值理念，而後探索在現實中實現的可能性；另一種是「現實的理想主義」（realistic idealism），它意味著，先對於現實社會進行分析，由此探索實現更爲理想的社會之可能性（山脇直司，2009：24-25）。山脇認爲他們的途徑是前者，或許是因爲如此，他們不懼被批判爲理想主義的風險，勇敢提出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論述。然而，在他們的論述中，依然缺乏在現實中實現其理想的具體思考。小林正彌說過，在日本「政治哲學幾乎不存在」（井上達夫，2009：201）。這一句確實符合日本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的特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伍、結論

面對 90 年代後日本政治社會的右傾化現象，日本自由民主派展開抵抗右傾化的言論，其中公共哲學與共生思想是甚爲流行的思想，其思想性質可說是日本式的多元論。鑒於此，本文透過他們大量言論的分析，探討日本多元論的特徵。

日本多元論的基本問題意識是，從國家層次到個人層次，在現實中我們不得不面對無法接納的「他者」，故在內含矛盾與對立的多元關係中，如何建立良性的多元秩序。在此問題意識之下，抵抗破壞多元性的力量「一」就成爲日本多元論的核心論點：「一」首先意味著具有向心凝聚力的國族國家。在日本的歷史經驗中，國家主義要求「滅私奉公」，但過度強調個人亦導致「滅公奉私」的現象，故爲了抵抗國家主義並拯救原子化個人，日本多元論提倡多元的公民社會。但與西方公民社會論不同的是，日本多元論具有強烈的反菁英的平等主義色彩；其次，國族國家往往以多數族群的認同爲核心，壓迫少數族群。經過 1970 年典範轉換，注重作爲他者的少數族群的思潮出現，如何在他者之間建立多元秩序，便成爲日本多元論的重要主題，此亦屬日本多元論抵抗「一」的一種表現；再者，在國際秩序上，「一」代表以西方中心主義爲象徵的帝國主義，故爲了抵抗西方中心主義，亦可見強調日本性的論述。而由於國族國家對內產生的壓迫以及帝國主義的對外擴張都是現代性的負面表現，爲了批判現代性的理論根源，日本多元論極力批判以「一」爲目標的、具有排除原理的辯證法思維。這意味著，如何克服現代性的弊端（亦即「近代的超克」），依然是現代日本多元論面臨的課題。至於實現多元理念的方法，透過接觸並認識他者的刺激，改變認知是日本多元論提及的方法。作爲政治思想，我們不得不承認日本多元論提及的方法相當簡略，在此亦可見理想主義的特質。

多元性的討論近年在日本相當流行，但有關多元性的課題可追溯到江戶末年西方勢力對日本的衝擊，如何因應作爲他者的西方＝現代性就是近現代日本一直以來面對的問題。就此意義而言，多元性實爲日本政治思想的核心議題，並非一時流行的討論。如本文所論及，在日本公共哲學與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思想的多元論中可見試圖克服西方思維的討論。但是，作爲其反面，強烈的日本意識也容易萌生，這就成爲警戒國族主義的日本自由民主思想面臨的難題。該如何解決多元性與日本主體性之間的矛盾心理，是日本多元論必須直視的兩難問題。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Arendt, H. 著，林宏濤譯，2015，《人的條件》，臺北：商周出版。譯自*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1998. Arendt, Hannah. Lin, Hong-tao. trans. 2019. *Ren de tiaojian* [*Human Condition*]. Taipei: Business Weekly Publications. Translated from *Human Condition: Secon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1998.

Lippmann, W. 著，任曉譯，2020，《公共哲學》，上海：上海譯文社。譯自 *The Public Philosophy*.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9. Lippmann, Walter. Ren, xiao. trans. 2020. *Gonggong zhexue* [*The Public Philosophy*].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Translated from *The Public Philosophy*.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9.

Poundstone, W. 著，葉家興譯，2019，《囚犯的兩難：賽局理論、數學天才馮紐曼，以及原子彈的謎題》，臺北：左岸文化。譯自 *Prisoner's Dilemma: John von Neumann, Game Theory, and the Puzzle of the Bomb*.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oundstone, William. Ye, Jia-xing. trans. 2019. *Qiufan de liangnan: saiju lilun shuxue tiancai fengniuman yiji yuanzidan de miti* [*Prisoner's Dilemma: John von Neumann, Game Theory, and the Puzzle of the Bomb*]. Taipei: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 Translated from *Prisoner's Dilemma: John von Neumann, Game Theory, and the Puzzle of the Bomb*.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小林正彌，2009，〈新公共主義的基本展望 ——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政治理論的觀點展開〉，佐佐木毅、金泰昌（編），《21世紀公共哲學的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122-162。Xiaolin, Zhengmi. 2009. “Xin gonggong zhuyi de Japan zhanwang: cong di er ci shijie dazhan hou riben zhengzhi lilun de guandian zhankai” [Basic Vision of Neo Republicanism: From a Viewpoint of Political Theory in Postwar Japan]. In *21 shiji gonggong zhexue de zhanwang* [*In Search of Public Philosophy in the 21st Century*], eds. Zuozuomu, yi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aichang Ki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22-162.

山脇直司，2009，〈「全球－地域」公共哲學的構想〉，佐佐木毅、金泰昌（編），《21 世紀公共哲學的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1-27。Shanxie, zhisi. 2009. "Quanqiu diyu gonggong zhexue de gouxiang" [An Idea of Glocal Public Philosophy]. In *21 shiji gonggong zhexue de zhanwang* [*In Search of Public Philosophy in the 21st Century*], eds. Zuozuomu, yi & Taichang Ki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27.

井上達夫，2009，〈向他者開放的公共性〉，佐佐木毅、金泰昌（編），《日本的公與私》，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159-214。Jingshang, Dafu. 2009. "Xiang tazhe kaifang de gonggong xing" [Public Legitimacy to the Other]. In *Riben de gong yu si* [*Public and Private in Japanese Context*], eds. Zuozuomu, yi & Taichang Ki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59-214.

卞崇道，2008a，《融合與共生——東亞視域中的日本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Bian, Chong-dao. 2008b. *Ronghe yu gongsheng: dongya shiyu zhong de Japan zhexue* [*Fusion and Co-living: Japanese Philosophy from a Viewpoint of East Asia*].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卞崇道，2008b，〈日本的公共哲學研究述評〉，《哲學動態》，11: 95-97。Bian, Chong-dao. 2008a. "Japan de gonggong zhexue yanjiu shuping" [A Critique on the Public Philosophy in Japan]. *Philosophical Trends* 11: 95-97.

任曉（編），2015，《共生：上海學派的興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Ren, Xiao. ed. 2015. *Gongsheng: Shanghai xuepai de xingqi* [*Co-existence: The Rise of the Shanghai School*].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江宜樺，2005，〈華人世界發展公共哲學的意義〉，黃俊傑、江宜樺（編），《公私領域新探：東亞與西方觀點之比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頁 55-73。Jiang, Yi-hua. 2005. "Huaren shijie fazhan gonggong zhexue de yiyi"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ing Public Philosophy in Chinese World]. In *Gong si lingyu xintan: dongya yu xifang guandian zhi bijiao* [*A New Study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A Comparison between East-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eds. Huang, Junjie & Yihua Jiang.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55-73.

西田幾多郎著，黃文宏譯注，2006，〈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西田幾多郎哲學選輯第二冊》，新竹：清大出版社，頁 249-336。譯自 "The Self-identity of Absolute Contradictorie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Kitaro Nishida Volume*

臺灣人學與期刊資訊網

8: 367-426. Toky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2003. Nishida, Kitaro. Huang, Wen-hong. trans. 2006. “Juedui maodun de ziwo tongyi” [The Self-identity of Absolute Contradictories]. In *Xitian jiduoang zhexue xuanji di er ce* [The Col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Volume 2]. Xinz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ress, 249-336. Translated from “The Self-identity of Absolute Contradictorie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Kitaro Nishida Volume 8: 367-426*. Toky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2003.

佐伯啓思，2009，〈國家・國民・公共性〉，佐佐木毅、金泰昌（編），《國家・人・公共性》，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159-190。Zuobo, Qisi. 2009. “Guojia guomin gonggong xing” [State, Nation and Publicness]. In *Guojia ren gonggong xing* [*State, Man and Publicness*], eds. Zuozuomu, yi & Taichang Ki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59-190.

佐藤將之，2009，〈作爲共生理念之基礎價值的荀子「禮」概念〉，中島隆博、小林康夫（編），《共生の哲学のために》，東京：UTCP，頁 23-39。Sato, Masayuki. 2009. “Zuowei gongsheng linian zhi jichu jiazhi de xunzi li gainian” [Xunzi’s Concept of Ritual and Social Norms as Fundamental Values for the Idea of Co-living]. In “*Gongsheng zhexue*” [*Toward a Philosophy of Co-existence*], eds. Nakajima, Takahiro & Yasuo Kobayashi. Tokyo: UTCP, 23-39.

尾關周二著，卞崇道、劉榮、周秀靜譯，1996，《共生的理想：現代交往與共生、共同的思想》，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譯自 *Modern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ve Co-existence*. Tokyo: Aoki Shoten Publishing Co. 1995. Weiguan, Zhouer. Bian, Chong-dao, Rong Liu,& Xiu-jing Zhou. trans. 1996. *Gongsheng de lixiang: xiandai jiaowang yu gongsheng gongtong de sixiang* [*Modern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ve Co-existence*]. Beij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ranslated from *Modern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ve Co-existence*. Tokyo: Aoki Shoten Publishing Co. 1995.

林美茂，2007，〈淺談全球化視閾中公共哲學的構築——以日本的公共哲學研究爲線索〉，馮俊（編），《哲學家》，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9-27。Lin, Mei-mao. 2007. “Qiantan quanqiu hua shiyu zhong gonggong zhexue de gouzhu: yi Japan de gonggong zhexue yanjiu wei xiansuo” [Public Philosophy’s Structure in Visual Limits of Globalization: Based on Japanese Public Philosophy Studies]. In *Zhe xue jia* [*Philosopher*], ed. Feng, ju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9-27.

林美茂，2009，〈公共哲學在日本的研究現狀與基本視點〉，《學習與探索》，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3: 17-23。Lin, Mei-mao. 2009. “Gonggong zhexue zai riben de yanjiu xianzhuang yu jiben shidian” [Research Review and Basic Viewpoints of Japanese Public Philosophy]. *Study & Exploration* 3: 9-27.

金泰昌，2009，〈後記〉，佐佐木毅、金泰昌（編），《21世紀公共哲學的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頁451-472。Jin, Tai-chang. 2009. “Hou ji” [Postscript]. In *21 shiji gonggong zhexue de zhanwang* [*In Search of Public Philosophy in the 21st Century*], eds. Zuozuomu, yi & Taichang Ki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451-472.

渡邊浩，2009，〈「おほやけ」、「わたくし」的詞義——「公」、「私」與「public」、「private」的比較〉，佐佐木毅、金泰昌（編），《公與私的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155-186。Dubian, Hao. 2009. “Ohoyake watakushi de ciyi: gong si yu public private de bijiao” [The Meaning of Oyake and Watakushi: In comparison with Gong, si, Public and Private]. In *Gong yu si de sixiang shi* [*Public and private in Comparative Intellectual Histories*], eds. Zuozuomu, yi & Taichang Ki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55-186.

黃俊傑、江宜樺（編），2005，《公私領域新探：東亞與西方觀點之比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Huang, Junjie & Yihua Jiang. eds. 2005. *Gong si lingyu xintan: dongya yu xifang guandian zhi bijiao* [*A New Study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A Comparison between East-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黑川紀章著，覃力、楊微、慕春暖、呂飛、徐蘇寧、申錦姬譯，2008，《新共生思想》，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譯自 *Philosophy of Symbiosis*. Tokyo: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1996. Heichuan, Jizhang. Tan, Li, Xi-wei Yang, Chun-nuan Mu, Fei Lü, Su-ning Xu, & Jin-ji Shen. trans. 2008. *Xin gongsheng sixiang* [*Philosophy of Symbiosi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Publishing. Translated from *Philosophy of Symbiosis*. Tokyo: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1996.

溝口雄三著，鄭靜譯，2011，《中國的公與私・公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譯自 *Public and Private in China*. Tokyo: Kenbun Shuppan. 1995. Goukou, Xiongsan. Zheng, Jing. trans. 2011. *China de gong yu si gong si* [*Public and Private in China, Public and Privat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Translated from *Public and Private in China*. Tokyo: Kenbun Shuppan. 1995.

齋藤純一，2009，〈現代日本的公共性話語〉，佐佐木毅、金泰昌（編），《日本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公與私》，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113-136。Zhaiteng, Chunyi. 2009. “Xiandai Japan de gonggong xing huayu” [On the Discourse about Publicness in Contemporary Japan]. In *Japan de gong yu si* [*Public and Private in Japanese Context*], eds. Zuozuomu, yi & Taichang Ki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13-136.

藤田正勝著，林永強譯，2016，《西田幾多郎：生與哲學》，臺北：聯經。譯自 *Kitaro Nishida: Life and Philosophy*. Toky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2007. Tengtian, Zhengsheng. Lin, Yong-qiang. trans. 2016. *Xitian jiduolang: sheng yu zhexue* [*Kotaro Nishida: Life and Philosophy*].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Translated from *Kitaro Nishida: Life and Philosophy*. Toky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2007.

二、日文部分

小田實，1978，《「共生」への原理》，東京：筑摩書房。

小林正彌，2003，〈丸山眞男と公共哲学：論争的構図〉，小林正彌（編），《丸山眞男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頁 1-37。

小林正彌，2010，《友愛革命は可能か：公共哲学から考える》，東京：平凡社。

小林正彌、菊池理夫（編著），2012，《コミュニタリアニズムのフロンティア》，東京：勁草書房。

小熊英二，2009，《1968・下》，東京：新曜社。

山岡龍一、齋藤純一，2017，《公共哲學》（改訂版），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

山脇直司，2004，《公共哲学とは何か》，東京：筑摩書房。

中島隆博、小林康夫（編），2009，《共生の哲学のために》，東京：UTCP。

井上達夫，1986，《共生の作法：会話としての正義》，東京：創文社。

井上達夫，1998，〈共生〉，廣松渉、子安宣邦、三島憲一、宮本久雄、佐佐木力、野家啓一、末木文美士（編），《哲学・思想事典》，東京：岩波書店，頁 343-344。

井上達夫，1999，《他者への自由：公共性の哲学としてのリベラリズム》，東京：創文社。

井上達夫，2020，《生ける世界の法と哲学：ある反時代的精神の履歴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東京：信山社。

井上達夫、名和田是彥、桂木隆夫，1992，《共生への冒険》，東京：每日新聞社。

公共哲學ネットワーク（編），2003，《地球的平和の公共哲学：「反テロ」世界戦争に抗して》，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日高六郎，1980，《戦後思想を考える》，東京：岩波書店。

田中秀夫、山脇直司（編），2006，《共和主義の思想空間》，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吉田夏彥，1977，《相対主義の季節》，東京：角川書店。

竹村牧男，2006，〈「共生学」の課題と展望〉，竹村牧男、松尾友矩（編），《共生のかたち ——「共生学」の構築をめざして》，東京：誠信書房，頁 1-18。

米原謙，2017，《日本政治思想》（增補版），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

西川潤、Marc Humbert（編），2017，《共生主義宣言》，東京：コモンズ。

西田幾多郎，1940，《日本文化の問題》，東京：岩波書店。

佐佐木毅、山脇直司、今田高俊、金泰昌、矢崎勝彥，2003，《公共哲学共働研究の成立過程と基本課題》，京都：將來世代總合研究所。

尾關周二，2002，〈共生理念の探求と現代〉，《「共生」思想の探求 —— アジアの視点から》，吉田傑俊、卞崇道、尾關周二（編），東京：青木書店，頁 12-35。

尾關周二，2015，《多元的共生社会が未来を開く》，東京：農林統計出版。

岡本智周、丹治恭子（編著），2016，《共生の社会学：ナショナリズム、ケア、世代、社会意識》，東京：太郎次郎社エディタス。

東鄉和彥、森哲郎、中谷真憲（編），2017，《日本発の「世界」思想哲学 / 公共 / 外交》，東京：藤原書店。

松下圭一，1994，〈＜市民＞的人間型の現代的可能性〉，《戰後政治の歷史と思想》，無（編），東京：筑摩書房，頁 171-201。

武谷嘉之，2017，〈共生社会論はどこへ向かうのか〉，福留和彥、武谷嘉之（編），《共生社会論の展開》，京都：晃洋書房，頁 17-48。

河森正人、栗本英世、志水宏吉（編），2016，《共生学が創る世界》，大阪：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阪大學出版會。

花崎皋平，1993，《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共生の哲学》，東京：筑摩書房。

花崎皋平，2002，《〈共生〉への触発：脱植民地・多文化・倫理をめぐって》，東京：みすず書房。

金泰昌（編著），2010，《ともに公共哲学す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首藤信彦、鳩山友紀夫，2019，《次の日本へ：共和主義宣言》，東京：詩想社。

桂木隆夫，2005，《公共哲学とはなんだろう》，東京：勁草書房。

高橋舞，2009，《人間成長を阻害しないことに焦点化する教育学──いま必要な共生教育とは》，東京：ココ出版。

崔勝久、加藤千香子（編），2008，《日本における多文化共生とは何か ── 在日の経験から》，東京：新曜社。

菅沼隆、河東田博、河野哲也（編），2014，《多元的共生社会の構想》，東京：現代書館。

黑川紀章，1969，《ホモ・モーベンス》，東京：中央公論社。

黑川紀章，1994，《黒川紀章ノート── 思索と創造の軌跡》，東京：同文書院。

黑川紀章，2006a，《都市革命 ── 公有から共有へ》，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黑川紀章，2006b，〈誤解される「共生」論議〉，岡田林太郎、吉田祐輔、清井悠祐（編），《黒川紀章著作集・第 13 卷》，東京：勉誠出版，頁 250-265。

稻葉振一郎，2008，《「公共性」論》，東京：NTT 出版。

齋藤純一，2000，《公共性》，東京：岩波書店。

寶月誠，2017，〈共生社会を目指して〉，福留和彦、武谷嘉之（編），《共生社会論の展開》，京都：晃洋書房，頁 1-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ublic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Kyosei*: Plural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Political Thought*

*Shinsuke Yasui***

Abstract

The situation of Japanese political thought changed after the 1990s upon the rise of national conservatism, which put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concept of "Japaneseness". Those with liberal democratic thoughts in Japan were urged to rebuild their values to oppose the right-wing, and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public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Kyosei started to increasingly receive attention. Both philosophies can be regarded as important branches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Japan, and both hold on to the ideals of pluralism.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uralism in Japanese public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Kyosei from the viewpoint of political thought. It finds that Japanese pluralism strongly resists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modernity, such as the nation-state and imperialism, and criticizes the principle of elimination found in the dialectic method. However, these philosophies do not state methods of realizing pluralism in detail—a defect of Japanese pluralism. Overall, this essay provides an important viewpoint for appreci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Japanese liberal democracy.

Keywords: Liberal Democracy, Symbiosis (Kyosei), The Japanese Left

* DOI:10.6166/TJPS.202112_(90).0001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anjing@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